

延安美术的当代价值

——以版画为例

◎包梦雪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大批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抗日救亡的使命奔赴延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当时文艺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艺术家们选择了可以进行大批量复制和印刷的木刻版画作为主要工具,以简洁、精炼的艺术语言向边区人民宣传革命思想。

一、延安美术的成就与特点

(一)美术创作以人民为中心

在紧张的抗战气氛中,争取民心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当时边区人民文化程度低,只靠文字去宣传和普及革命指导思想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我们党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通过美术作品向大众宣传革命思想;其次文艺工作者还参与百姓的生活,了解百姓的真实愿望,创造出百姓能接受和欣赏的艺术作品,从而统一民心,共同抗日。

古元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受到党的文艺思想的指导,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力图刻画农民最真实的形象。《减租会》是古元杰出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是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与地主据理力争的场面。作品采用黑白木刻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这幅作品的创作,古元谈到:“当我看见报上登载绥德农民向地主进行斗争,讨还非法多收的租子的消息,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马上就想创作一幅木刻……我回忆许多开会的场面,我以他们的形象作依据,创作了《减租会》。”虽然古元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但是他能够根据生活经验创作出如此真实的作品,正是他在农村切身的经历,才将农民和地主的形象把握的如此准确。这样的作品既贴近生活,还起到了鼓舞农民勇敢站起来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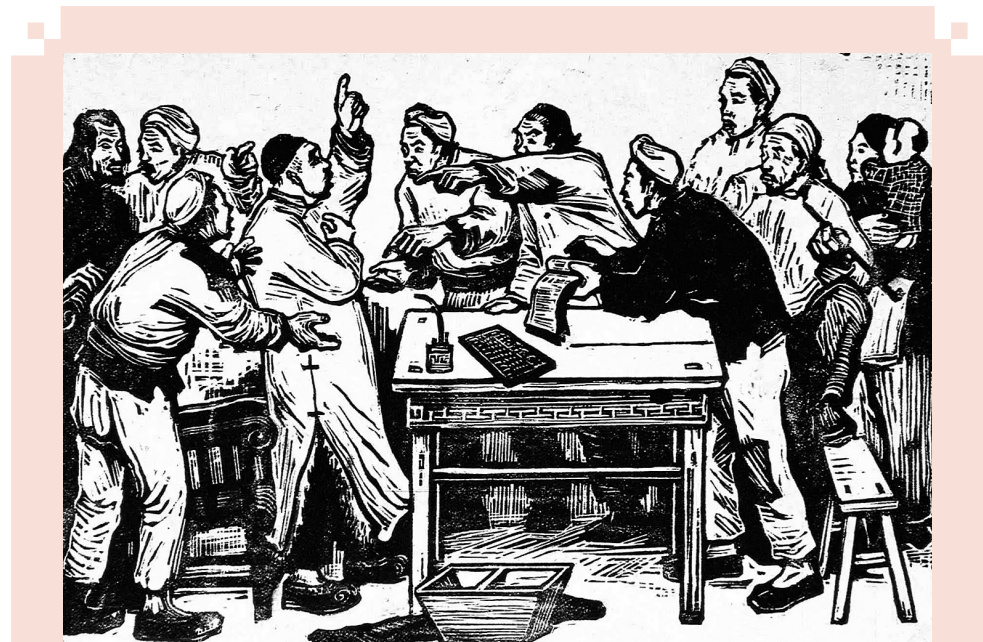
作品《离婚诉》来源于古元工作期间亲历的事件。在1940年,古元以阴历法制作了《离婚诉》,后来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在1942年,“我又重刻了一幅《离婚诉》,和之前的刻法就大相径庭,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群众也就喜欢接受了。”作品截取离婚时的场面,主人公勇敢站起来向封建落后势力和旧婚姻制度的挑战,透析了妇女思想意识的进步,更易于向边区人民传达进步意识。在古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农民形象和农民生活,创造了具有鲜明大众化倾向的艺术风格,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题材上不同于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而是极大地歌颂人民的新生活,赞美人民的高贵品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二)创作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作品

江丰在《回忆延安木刻运动》一文中讲到:“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的,是以群众化为前提,促进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群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成为激发他们革命觉悟的精神食粮。”

力群的套色木刻《丰衣足食图》,采用民间年画的形式展现人民丰衣足食的情景。画面构图饱满,对于版画语言的熟练运用和民间色彩的借鉴,使得该作品受到了老百姓的喜爱。马达的《推磨》在技法上画家撇弃了早期木刻欧化的明暗画法,采用中国传统的阳线刻制,通俗易懂,画面简练又不失重量感和黑白节奏感。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国内掀起了新年画



《减租会》 古元



《离婚诉》 古元



《丰衣足食图》 力群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彦浩



《推磨》 马达

创作的热潮,学习传统年画的人物造型,以阳刻为主,色彩鲜明热烈。彦涵的《开展民兵爆破运动》、力群的《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和冯真的《娃娃戏》等这些作品都是符合人民审美趣味的新年画形式,受到了广大百姓的好评。

延安美术工作者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创作了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和体现人民需求的美术作品,不仅迎合了老百姓的审美需求,还极大地传承和发展了民间美术,将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技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整合创新,使其成为中国美术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了美术创作向民间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三)美术创作是对时代的生动记录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延安的文

艺指导思想决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态度立场。

彦涵的部分版画作品被认为是记录抗战最重要的图像文献。1938年他怀揣抗日救亡的赤诚之心投奔延安,他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应了党的号召,同时也鼓舞了广大百姓共同抗战的斗志。作品《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画面描述的是战士爬上战壕准备战斗的场面。整幅画面传达出紧张的气氛,把战争的真实瞬间表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反映了军民同心誓死杀敌的顽强信念,也激励了老百姓英勇向前的斗志。

彦涵的艺术创作是对时代的生动记录,作品《豆选》描绘的是在选举活动中,由于农民不识字,所以用豆子来代替选票,选举人在碗里放豆子的民主选举过程,反映出



伟大抗疫精神的精湛呈现

——读《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有感

◎马永真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对口支援湖北省荆门市(含武汉市)医疗队随行记者——内蒙古日报社记者刘春所著16万字的《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以下简称《天使出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作为“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程”的重点作品之一,于2021年11月隆重推出,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刘春因其在援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0年1月28日,是内蒙古援鄂医疗队出征的日子。《天使出征》这部熔铸作者亲身经历和饱蘸激情写就的纪实文学作品,记录了那两个多月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点点滴滴,全方位描述了“天使”们的英雄壮举和感人事迹,唱响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与湖北人民心连心,视新冠患者为亲人,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战地”之歌。有道是,“国有战,招必来,战必胜!”《天使出征》一书共收录了20篇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真实而感人的生动故事,篇篇故事如同一个旋转的舞台和人物画廊,典型地展示了出征“天使”们的英雄群像。在每个故事中,有一个或几个或多个主角,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队员的风采。

在记者的眼中,一双双流过泪水的眼睛更加明亮,一颗颗奔赴国难的赤子之心更加坚强,一个即将拿起“武器”的战士更加勇敢……这些卓有成效和富有前瞻性的工作把握,充分彰显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管理实力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他们既有顽强的抗

精神,又有精湛的医术,他们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天使出征》以故事的形式,对医疗队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展示。全书最后以《英雄归程》结束,与首篇《目的地:湖北荆门》首尾相顾,相互呼应,“一气呵成”。《荆门手记》选载的13篇“手记”,记录了作者作为一名随行“战地”记者的工作与心理感受,为书中每一篇

故事来源提供了诠释和写作线索。“手记”还披露了这些故事在当时产生的阅读热度,反映了纸质与融媒体载体同时存在的新闻时代,作为纪实文学——故事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感染力量。

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重要的因素,除了其内容能给人以启迪和信心,就像火把一样为人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我愿意相信,刘春的《天使出征》会在我国当代纪实文学榜单中留下闪烁的光芒,因其真实记录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勇壮举,而永载当代文学史册。新冠肺炎疫情终将会过去成为历史,但是《天使出征》中所塑造的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英雄群像,会永远鲜活地镌刻在广大读者的脑海里。

《天使出征》之所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近距离目睹了医疗队在湖北省荆门市、武汉市英勇抗疫的战斗,作者与医务人员一样感同身受。甚至基于职业敏感的驱使,较之于医务人员,他能从更多的方面深入观察,悉心捕捉,“动态记录出征的每一天,把思想镌刻在故事里”(《荆门手记》),在书中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抗疫细节(医务人员和病毒是在一米以内博弈)和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战疫”场景,塑造出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那些“最可爱的人”,写出了“最可爱的人”的精彩故事,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从受众的审

美感受来说,作品打动人的,首先是那些故事与故事中的细节,而支撑故事的背后却是整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包括艺术结构、人物塑造,甚至语言特色。

可以说,由于纪实文学,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这场特殊战役,它是作者在艺术创作的沙场上运筹帷幄的结果。在这里,我为作者的艺术把握而鼓掌。一是该作品对出征“天使”的成功刻画和对一线“战士”精神的褒扬,归功于其对故事细节的深入挖掘和精心描写。在《天使出征》中,大量精彩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支持了人物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画廊。二是作品细腻地反映医患之间的心理活动,折射出人间心灵之美的艺术穿透力。在这次援鄂抗疫“战场”上,发生了许多像李菲护士与患者大姐相互鼓励、洋溢着医患亲情的故事,作品揭示了医患之间都为对方着想的暖心境界,使作品具有了超强的精神亲和力 and 人间大爱之美感。三是作品处处透露出艺术语言的不同凡响。《天使出征》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作者十分重视素材挖掘、情节追问,即向医务人员追问工作、生活和心理活动的细节,做好“二次采访”。他的《荆门手记》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带有新闻性的纪实故事,更需要强大的语言运用能力,《天使出征》达到了这一创作预期,在叙事和医患对话中精彩语言无处不现,构成了《天使出征》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版4月14日刊发的文章《纯真实,更具超乎寻常的感染力——读<许廷旺动物小说集>,作者为:张锦贴。)

演绎经典亦需有度

◎周慧虹



经典名著与喜欢玩梗年轻人的一拍即合,往往能催生出花样翻新、令人叹服的创意效果。当前,一些年轻人以种种方式“花式”演绎《红楼梦》,就不免使人眼前一亮。

最近,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惹人话语在网络上翻红,许多网友模仿黛玉语言风格造句引发热议,折射出《红楼梦》在当代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而除此之外,在许多高校,“红学”研究社团蓬勃发展,不止于传统的读书会、讲座活动,莘莘学子或在毕业作品中设计红楼文创家具,或将《红楼梦》中相关元素融入绘画、雕塑、插画、摄影作品,抑或,从医药、健康等独特视角品谈《红楼梦》,以及在视频网站二次创作剪辑《红楼梦》等等,让人感受到经典文化在传承与创新方面的独特魅力。

经典之作,它们经受岁月洗礼,总能历久弥新。对此,卡尔维诺说得:“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就拿《红楼梦》来说,自古而今,种种对其解读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原著及其解读内容究竟是不是读者盘子里对胃口的菜,最终还需要读者自己细细咀嚼、消化吸收。

我愿意相信,那些以其自身才华“花式”演绎《红楼梦》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有着活跃的思想,而且,在与这部名著牵绊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而当他们将这种“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以契合己意的方式呈现出来时,这对他们自身文艺趣味的提升是潜移默化 and 实实在在的,同时,也势必影响带动周围更多人沉浸其中,进而增强其对于经典名著的亲近感。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经典名著广泛深入地走进大众生活,正襟危坐字斟句酌是一种方式,像这种不怎么循规蹈矩的“花式”途径,同样不失为方便快捷的可行方式?

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年轻人“花式”演绎《红楼梦》固然令人欣喜,不过,“花式”演绎亦需有度。对此,正如教育界人士指出的,“不同学校可以突出各自特色,发挥更多创意,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对经典文学抱着尊重的态度,无底线的恶搞不可取。”

关于“经典”,《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阅读经典,能给人更多的滋养,使人明锐、深刻而优雅。尽管,多数人对于经典作品心存敬意,然而毋庸置疑,相比于一般读物,经典阅读对读者知识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又要更高一些。在这个推崇全民阅读的时代,既然,“花式”演绎有助于吸引读者,有助于促使经典复活,那么,但愿社会相关各方能够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不断探索更富意趣的方式,引导大众与经典亲密接触,使经典更好地传承下去,源远流长。